

著作者说

□刘心武

《也曾隔窗窥新月》是刘心武关于当代文人群像的一次集中书写。他以亲身经历讲述了时代激荡与文坛变迁中55位文坛名宿的沉浮故事，刻画出这些温润智者历经岁月尘烟与人生风雨之后素心不移、凝视新月的境界。



我十四岁那年，在一个绿皮本上写诗，第一首叫《绿色交响乐》，被母亲偶然发现。她说：“倒有些‘新月派’的味道，不过现在是新时代，你不要学那种旧格调！”我驳她：“我看过鲁迅文章，知道‘新月派’不好，我怎么会去学？何况我到哪里去看‘新月派’的诗？我一首也没有见过啊！”听完，母亲也就算了。

那一年我订了《文艺报》，那时的《文艺报》四开，左侧有骑马钉，是杂志，但在封面报头下就刊发文章，又很像报纸。记得有期封面的文章标题赫然是《烦琐的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？——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》，署名唐挚。父亲瞄过几眼后说：“能跟周扬同志商榷？看来真的是推行‘百家争鸣’了！”那时《文艺报》为周刊，有一期发表了个座谈会报道。与会者里有个陈梦家，当时已经搞文物研究，但作为三十几年前的“新月派”诗人，又被请出来重返诗坛。他在发言里自称：“我是出土文物。”但他似乎也还没有马上出版他的诗集。我问父母当年是否读过他的诗？母亲说记得一句：“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……”父亲说连这句也不记得，但见过照片，是个美男子。我那时就想获悉陈梦家除“一朵野花”以外的其他诗句。

那一年又开始了普选。母亲参加街道工作，为此忙碌。我未成年，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，当然置身事外。如今从人民网上查到：1953年4月2日，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《关于

也曾隔窗窥新月

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》和《关于选民资格若干问题的解答》，拉开了新中国第一次人民代表选举的序幕。

记得那年夏天，我们钱粮胡同的部分选民，在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里发放选民证，我在家里隔着有花式隔栅的玻璃窗，能望见那边马缨花树下的景象。母亲自然是张罗者之一。她在回屋取东西的时候，笑着对我说：“么么，隔壁的陈梦家先生在帮忙核对姓名呢，你不看看他吗？”我就赶紧隔窗窥望，于是一位俊逸儒雅的中年男子进入我的视野。他虽然穿的也是蓝布的干部服，但是浓黑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，衣裤和皮鞋一尘不染，一脸蔼然的微笑，在那里与一些人交谈。

三十二年以后，我和唐挚成了邻居。唐挚是笔名，真名唐达成。再两年以后，我们都赋闲，有时我就去他家闲聊。不知怎么就聊到陈梦家。达成说梦家不仅诗好，还是古文字专家，家里收集的明式家具，价值连城，美轮美奂。我补充说：“还是个美男子。”达成淡淡地问：“你见过？”我告诉他：“那时我家住钱粮胡同35号，是海关总署宿舍，很大的院子，隔壁34号缩进一块，是个小四合院，那就是陈梦家的私宅。”达成想了想，摇头：“不对吧。北京的门牌，都是路这边单号，路那边双号，34号怎么能跟35号挨着？”偏那时候我正研究北京的胡同，就告诉他，原来北京街道胡同的门牌编号都是从一边编起，到头后再拐到另一边，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改成一边单号一边双号的。达成感叹：“多少事，多少变迁，越往后越难弄明白了！”我就把

当年隔窗窥望陈梦家的故事讲给他听。达成叹道：“我那时候糟糕，毕竟是写了大块文章跟周扬叫板。陈梦家只不过是有一次发言，建议文字改革应当慎重。他是研究古文字的，他的意见可供参考啊。”

达成的话令我忆起母亲讲到的情况。母亲说，她去34号院请陈梦家帮助街道核对选民证，他很高兴，说应该出力。可是就在我们院那棵马缨花树下，有位七十一岁的选民，不接他那张选民证，他说自己七十年来一直姓葉，现在凭什么给他改成了姓叶？如果接过那张证，他怎么对得起葉家列祖列宗？他竟声泪俱下。那一年刚刚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。有的字，确实简化得好，比如把“體”简化为“体”，“人之本为体”嘛，“幣”简化为“币”，也很容易接受，“樹葉”简化为“树叶”还好，把姓氏“葉”简化为“叶”，人家一时难以接受，也应该理解。母亲当时只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好笑的插曲道出。她还讲到，陈梦家建议在选民张榜时，遇到每位姓名中有被简化的字时，后面加一括弧将原来写法列出，不过他的这一建议未被采纳。那么，当年陈梦家之所以在鸣放中发表“文字改革应当慎重”的观点，是否也与他那天在我们院子马缨花树下的遭遇有关呢？

我四十四岁那年，在一个中外文学交流活动中，见到赵萝蕤女士。我知道她是陈梦家的遗孀。但那时候也还没有《梦家诗集》出版（在我六十四岁的时候中华书局才出），我也仍然只是知道梦家有句“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”的诗，但我知

道赵萝蕤女士恰是美国现代派诗人艾略特长诗《荒原》的中文译者，两个“荒原”令我有宿命的惆怅。我那时候也知道，赵女士住到美术馆后街她父亲赵紫宸家去了。那次我和赵女士邻座，她知道我，我也知道她，但是她没有问及我的写作与编务。我心里有陈梦家，有《荒原》，有钱粮胡同，但我们彼此没有以上内容的交谈。我们谈及西洋古典音乐，那时候CD盘在中国还远没有普及，我们家里都只有收听大唱盘和盒带的音响，我们各自道出最近最心爱的盒带。她听说我有法国作曲家、管风琴演奏家弗兰克的盒带，眉毛上挑，非常惊异：“你哪里得来的？从巴黎买回的？”我就告诉她，是在金鱼胡同东口对过（现已拆辟为金宝街）的一家国营商店买到的。那一家专卖进口的大唱盘和盒带，时常可以遇到很特别的品种，比如弗兰克的这盘管风琴曲，他们只进口了两盒，我买时仅剩一盒。说到这里，她笑道：“那盒该是我买啊！不知究竟谁给买走了！”我就表示将我那盒赠予她（我知道她父亲是神学家，弗兰克的管风琴曲多为圣乐），她说：“哪能呀，咱俩互通有无吧！都允许对方翻录，完了物归原主，好吗？”一言为定后，我首先将弗兰克的盒带换来她的好版本的德沃夏克的《自新大陆》，后来我们又有所交换。

但这种美好的交往未能持续。我五十六岁时从网上看到赵女士去天堂与梦家会合的消息。下一年，达成兄去世。再一年，赵家那极具文物价值的四合院被拆掉。“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。”

以她之名

□黄荭 沈祯颖

《她之所以为她：女人不是生而顺从，而是变得顺从》书名中的“女人不是生而顺从，而是变得顺从”显然是化用了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在《第二性》中那句最有名的论断：“女人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后天变成的。”而事实上，出生于1985年、毕业于巴黎高师哲学系的玛依·加西亚的确一路在追随她的精神导师波伏瓦的脚步，她的这本处女作也明显沿袭了波伏瓦在《第二性》中开创的女性主义现象学的研究方法，从女性的角度对她们的处境和体验做尽可能忠实的再现，进而深入挖掘女性顺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。这本书既是对波伏瓦哲学思想的回顾和致敬，也是对其女性主义研究的拓展和细化。

传统的权力观往往关注权力“自上而下”的作用方式，故此，大多数女权主义运动也因袭性地将矛头指向男性统治对女性的规训、盘剥和压迫。而玛依·加西亚研究的独到之处是做了一个研究视角的转换，从顺从者角度而非征服者角度来考察女性顺从现象。这一视角转换有助于揭露两性关系中最隐秘也最微妙的部分，以“自下而上”的方式展示并分析一种主观经验。她提出并思考的问题是，男性统治对女性个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？女性如何体验她的顺从？面对男性统治，自觉不自觉中，女性的态度常常

爱我所爱，且用我的方式去爱

是矛盾而暧昧的，就像作者在本书开篇写的：

即使是那些最有独立意识、最具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，也会在不经意间发现，她们享受男性对她们投来的具有征服意味的目光，她们渴望成为伴侣怀中一只温顺的宠物，相比那些看上去更能让她们绽放自我的工作，她们更愿意去干干家务活儿，从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、为家人精心准备的早餐中获得小小的乐趣。这些欲望和乐趣同女性的独立是否矛盾？是不是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女性解放运动的背叛？

哪怕是在21世纪的今天，我们也经常会听到社会上两种此起彼伏的声音：一种呼吁女性独立自主，追求自己的事业，争取两性平等；另一种鼓励女性回归家庭，相夫教子，侍奉公婆。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归纳为现代和传统两种观念的冲突，然而，若要对这种司空见惯的女性顺从现象进行理论建构却非易事。尽管女性顺从经验的普遍性、多样性和矛盾性无可否认，但西方古典哲学一直以来都把它视作女性对天赋自由的放弃、一种道德上的缺失，这种性别偏见让古典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采取了习惯性无视的态度。因此，正如本书作者玛依·加西亚敏锐指出的，“女性顺从既是社会现实，又是哲学禁忌”。她希望借助哲学，尤其是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的哲学思想，聚焦女性顺从这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却又不断被遮蔽的哲学命题，试图揭开它的

真实内涵，分析造成这种顺从的个人和社会结构的深层原因，探讨可能的解放之道。

在玛依·加西亚看来，既然女性顺从是特殊的经济、社会和政治条件下的必然结果，那么要改变女性的处境，就必须打破产生女性压迫的机制，使顺从不再成为女性的既定命运。在方法论层面上，她提出女性要敢于承担自由的风险，通过工作和劳动为自己的独立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，从而改变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。然而，我们也知道，在实践层面上，尤其是对个体而言，摆脱既定秩序的影响并非易事。即便是对波伏瓦这样卓尔不群的女性主义者来说，在处理现实的情感关系时，面对萨特，她也难以真正超越女性在潜意识中对男性权威的崇拜和顺从。她的《女宾》《名士风流》和《独白》中都不乏在爱中迷失自我、完全顺从并依赖男性的女性角色。也正因为男尊女卑、夫唱妇随的传统由来已久，要打破这种根深蒂固、习以为常的压迫机制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，况且绝大多数现代女性除了工作上班之外，依然承受着生儿育女、洗衣做饭、照顾家人的生活压力，有多少女性在这些日复一日、琐碎繁复、“看不见且没有薪酬的”家务劳动中变成了“绝望的主妇”。

玛依·加西亚认为，实现两性平等最重要的是改变观念，质疑和挑战所谓的“天经地义”和“理所应该”。对女性最大的禁锢是她们自身对顺从的接受和认同，使

她们成为自身顺从的“共谋”。要改变女性顺从的地位，就必须要让女性个体觉醒，放弃顺从带来的安稳和特权，敢于承担自由的风险，主动掌握人生的选择权。诚如德国女性主义心理学家乌特·艾尔哈特所言，“好女孩上天堂，坏女孩走四方”。好女孩接受社会的规训，而坏女孩敢于和传统决裂，敢于面对未知的风险，敢于发掘更多的可能性，敢于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这里的“坏”已无关传统道德体系下的价值判断，而是代表了一种新时代果敢自由的女性形象，她们不再是他人的附属品，不再为家庭牺牲自己的理想抱负，而是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为之奋斗，追求更多的自主权。女性扭转顺从命运的拐点就是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处境，坚定地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。

只有在一个越来越开放、越来越平等的社会，女性才能撕掉“顺从”这一古老的道德标签，自由地去追求向往的生活，不在爱情中迷失，爱我所爱，且用我的方式去爱，就像波伏瓦在《第二性》中所期盼的：有一天，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“强”去爱，而不是用她的“弱”去爱；不是逃避自我，而是找到自我；不是自我舍弃，而是自我肯定。那时，爱情对她和对他将一样，将变成生活的源泉，而不是致命的危险。

（本文节选自《她之所以为她：女人不是生而顺从，而是变得顺从》导读）